

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主办

王继平◎主编

曾国藩研究

ZENG GUOFAN YANJIU

【第1辑】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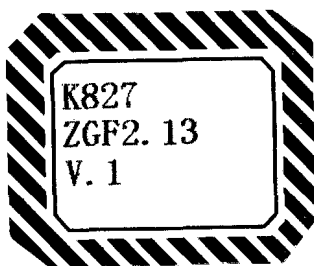
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 主办

王继平◎主编

曾国藩研究

ZENG GUOFAN YANJIU

【第1辑】



湖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曾国藩研究.第1辑 / 王继平主编. — 长沙: 湖南人民出版社,
2007.6

ISBN 978-7-5438-4807-8

I. 曾... II. 王... III. 曾国藩(1811~1872) - 人物研究
- 文集 IV. K827=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057375 号

责任编辑: 龙仕林

装帧设计: 杨丁丁

曾国藩研究(第1辑)

王继平 主编

*

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网址: <http://www.hnppp.com>

(长沙市营盘东路3号 邮编: 410005)

(营销部电话: 0731-2226732)

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益阳三邦印务有限公司印刷

2007年6月第1版第1次印刷

开本: 787×1092 1/16 印张: 23.25

字数: 394 000

ISBN 978-7-5438-4807-8

定价: 42.00 元

《曾国藩研究》编辑委员会

主办 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

主编 王继平（湘潭大学）

委员 欧阳哲生（北京大学）

郑大华（中国社会科学院）

方光华（西北大学）

唐浩明（岳麓书社）

李建国（湖南人民出版社）

王晓天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）

刘云波（湖南省社会科学院）

李育民（湖南师范大学）

周秋光（湖南师范大学）

杨鹏程（湖南科技大学）

彭先国（湘潭大学）

罗玉明（湘潭大学）

郭汉民（湘潭大学）

章育良（湘潭大学）

陈代湘（湘潭大学）

编辑部成员

王继平 章育良 李永春 周锦涛

CONTENTS

目

录

目 录

2006 双峰国际曾国藩学术研讨会论文专辑（上）

- 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述论 翁 飞(1)
- 略论曾国藩开其端的近代军阀幕府 张学继(67)
- 曾国藩与倭仁关系论略 李细珠(79)
- 曾国藩和晚清军事变革 史滇生(90)
- 曾国藩“将领中心制”治军思想的历史评价 郑 汕 刘利勤(99)
- 曾国藩治军思想与近代军队建设 华 强(106)
- 曾国藩的治军方略与毛泽东军事思想探源 薛学共(115)
- 曾国藩家训与家族管理 刘鹏佛(126)
- 论曾国藩的现代化意识及其意义
- 兼论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的路向 王继平(139)
- 曾国藩与太平天国档案有关的几个问题 刘金元(148)
- 曾郭交谊与郭嵩焘筹饷 李永春(154)
- 曾国藩幕僚中的新型知识分子 仓田明子(172)

曾国藩和他的亲信史家

- 从清末到民初太平天国起源传说的形成过程 水盛凉一(183)

湖湘学术文化

- 周敦颐思想的特色及其在湘学史上的地位 陈代湘(197)
程朱理学与湘军集团 张昭军(208)

湖南社会

湘勇形成前夕湘乡县的宗族婚姻关系

- 以双峰县荷叶地区为中心 河野吉成(224)
清朝前期(1644-1839)湖南水灾研究 杨鹏程(240)
分利集团对近代湖南灾荒时期粮食价格的影响 余振文(251)
《湖南通志·祥异志》中的灾荒探究 朱金辉(263)

专题研究

- 传承与革新：中国慈善事业近代化述论 周秋光 曾桂林(272)

文献钩沉

- 曾纪泽散佚家书辑考 孙海洋(300)
曾国藩书信拾遗一通并论其相关情事 董丛林(313)
从《湘勇源流记》探湘军之兴起 朱金云(320)

评论

- 近百年来曾国藩幕府研究述评 成晓军 崔志远(327)
近十年中国内地曾国藩研究综述 刘志靖(340)
简评郭汉民著《晚清社会思潮研究》 李永春(354)
专制残照里的湖湘学风灿烂一瞬
——读王继平《晚清湖南学术思想史稿》 向敬之(360)

- 编后记 (362)

曾国藩与李鸿章关系述论

翁 飞

一 引 言

曾国藩与李鸿章的关系，历来为史家所注目，不少学者亦均有专文专著论述，其中不乏精到的见解与分析。然而，或许是受资料或篇幅的限制，尚未看到对两人关系之始末有较为系统清晰的全貌勾勒；在对许多具体问题的评说上，比如李在曾幕是否“见知”、金陵“让功”的背景和意义以及剿捻瓜代引起冲突的性质等等，也是意见分歧，言人人殊。所幸岳麓书社新版《曾国藩全集》已经出齐，而笔者又有幸参与安徽教育出版社正在整理出版的新编《李鸿章全集》的编校工作。因此，本文即以曾李二人往来公私信函及奏牍咨札等作为主要依据，佐以相关文献史料，力图从一般基本史实的钩沉和铺叙中，廓清曾李交往中的层层细节，以使人们对这两位影响近代中国历史的关键人物，其功名进退、立身处世，有着更为直观和深入的了解。限于学识和功力，不当之处，敬请方家批评教正。

二 老师与门生

道光十八年（1838），曾国藩中式进士，朝考时，以一篇《顺性命之理论》赢得道光帝的赏识，而入选翰林院，足见他在理学上已打下了相当深厚的根基。此后，曾国藩益以精研理学为己任，试图通过对自身严格的修养，达到治国、平天下的境界。这种对人格的严格的“省察”与“克治”，也极大地影响了其后来的治军事政。但如果详加考察，曾国藩的学理结构中并不

完全是理学的内容。他的朋友欧阳兆熊曾经评价其思想体系为“一生三变”，即：在京官时，以程朱为依归；及出而办团练，又变而为申韩；至（咸丰）八年夺情再起时，则一以柔道行之。^①他自己后来也曾总结道：“细思立身之道，以禹、墨之‘勤俭’，兼老、庄之‘静虚’，庶于修己、治人之术两得之矣。”^②有论者据此认为，曾国藩“是一个以理学为核心、儒学为主体，集古今思想之大成的杂家”，“他吸收各家之长杂糅一体，以加强自身的修养，提高治国的本领。”^③

曾氏这种博采众长、折中各家的治学态度，显然与他个人的经历有关。在进入翰林院以前，曾国藩是个几乎只知举子业的湘乡普通士子，他自己也承认直到第一次会试（1834）进京后，方知天下学问可学者甚多。^④于是在他日后常住北京时，便像一块投入学问之海的海绵，尽情吸纳着各种学问。另一方面，从供职翰林院起，由于受到恩师、军机大臣穆彰阿的加意提携，^⑤使他在不到十年亦即37岁时，便升到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衔，“由从四品骤升至二品，超越四级。”^⑥一路扶摇直上。此后，又历署礼、兵、工、刑、吏诸部侍郎，成为红极一时的新晋大吏。

然而，仕途的顺利并没有使曾国藩仅仅满足于做一个达官贵人，而是激励他去追求封建士大夫的最高情趣，即成为名臣、做大学问家。为此，在十余年的京官生涯中，他更加刻苦自励、求师问学，曾经先后与程朱理学、汉学、经世学派以及桐城文派的中坚人物唐鉴、倭仁、吴廷栋、王茂荫、梅曾亮等人切磋往返，尤其注重对理学的钻研，以使自己的学识见解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。

因此，当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）李鸿章以一个青年学子赴京孜孜猎取功名的时候，曾国藩已经是翰林院的侍讲学士，并以精研义理名动京师了。二十初度的李鸿章，才华横溢，出手不凡，在赴京途中，曾写下了《入都》诗十首，“为世所传诵”。其中诸如“丈夫只手把吴钩，意气高于百尺楼；一万年来谁著史，三千里外欲封侯。”“马是出群休恋栈，燕辞故垒更图新；遍交海内知名士，专访京师有道人。”以及“即今馆阁需才日，是我文章报国时。”

① 欧阳兆熊：《水窗春吃》卷上，中华书局1984年版，17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岳麓书社版（以下简称《曾集》）日记一，574页。

③ 朱东安：《曾国藩传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，312、313页。

④ 参见李荣泰：《湘乡曾氏研究》，台湾大学出版委员会文史丛刊之八十一，52页。

⑤ 徐珂：《清稗类钞》第3册，1404页，穆彰阿：“第于御前奏称曾某遇事留心，可大用，……自是颺颺响用矣。”

⑥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家书一，147页、149页。

“倘无驷马高车日，暂不重回故里车”。^① 尤为脍炙人口，真实地展示了这个青年学子极欲出人头地的胸襟和抱负。不过此时李鸿章的志向还只是由科举制艺的典籍中陶冶出来的，并没有突破传统的“修、齐、治、平”的模式。也许正是这一点，使他和年长十二岁的曾国藩一拍即合，得以实现其“去访京师有道人”的夙愿，并从此结下了两人的终生不解之缘。

李鸿章的父亲李文安时任刑部郎中，与曾国藩为戊戌科同科进士，由于这一层关系，李鸿章入京不久，即以年侄身份投帖拜在曾国藩门下。当时，各地应试士子组织文社，“慕曾涤生夫子之名，请渠出任社长，社规每月应交文三篇、诗八首。”^② 李鸿章也积极参与其中。1844年，他在北闱甲辰乡试中一举考上举人，诗名大噪，但却在次年的恩科会试中落第。曾国藩充任此次会试的同考官，并没有因李鸿章的暂时蹭蹬而放弃对他的器重，反而认为他“才可大用”。^③ 正如李鸿章在《禀母》函中所称：“初次会读，男以诗文受知于曾夫子，因师事之而朝夕过从，求义理经世之学”。^④

那么，曾国藩的义理经世之学是些什么内容呢？他参合古今，旗帜鲜明地提出了：“为学之术有四，曰义理、曰考据、曰辞章、曰经济”。^⑤ 在桐城派姚鼐所提出的义理、考据、辞章三条传统的治学内容上，又增加了“经济”亦即经世济民之术。他认为这四种学问“阙一不可”，并说：“义理之学，吾之从事者二书焉，曰四子书，曰近思录；词章之学，吾之从事者二书焉，曰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，二书暂尚未筹集成帙，然胸中已有成竹矣；经济之学，吾之从事者二书焉，曰会典，曰皇朝经世文编；考据之学，吾之从事者四书焉，曰易经，曰诗经，曰史记，曰汉书。此十种者，要烂熟于心中，凡读书皆附于此十书，如室有基，而丹雘附之；如木有根，而枝叶附之；如鸡伏卵，不稍歇而使冷；如蛾成蛭，不见异而思迁；其斯为有本之学。”^⑥

应该指出，在这四种“有本之学”中，曾氏对他自己所提出的经济之学倾注了更多的精力和心血，他曾经多方搜集，选录了清代有关盐课、海运、钱法、河工等方面的奏议六卷，任工部时，尤“究心方輿之学，左图右书，钩校不倦，于山川险要、河漕水利诸大政详求折中。”^⑦ 而他自己所津津乐

① 《李文忠公遗集》卷六。

② 《李鸿章家书》，上海共和书局版，7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15页。

④ 《李鸿章家书》，7页。

⑤ 《曾文正公杂著》卷四，6页。

⑥ 《求阙斋日记类钞》卷上，8页。

⑦ 黎庶昌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岳麓书社版，16页。

道、胸有成竹的词章之学，曾氏读古文钞与曾氏读诗钞（亦即他后来所编定的《经史百家杂钞》），其要义就在于将文章与政事相结合，以了解历朝历代的治乱兴衰、典章文物、学术思想和经国治民之道与术，从而使辞章、义理和考据都归宿于经济，使道咸时期的经世思潮，在他本人的治学上得到了集中的体现。

不仅如此，曾国藩还十分清醒地关注着鸦片战争以来日益腐败的社会现实。据记载，道光丙午（1846）夏秋之交，曾国藩因患肺病，“僦居城南报国寺”，^①他一方面与经学家刘传莹等谈经论道，一方面又与郭嵩焘、江忠源等湘籍友人“淪茗剧谈，以承平久，万事隳坏，忧且乱，相与慨焉发愤。”^②曾国藩并有诗抒怀：“俗儒阁阁蛙乱鸣，亭林老子初金声。”^③报国寺前名慈仁寺，曾经是明末清初进步思想家顾炎武的栖居之所，并因其“天下兴亡，匹夫有责”的胸襟抱负而改现名；由此也可以说是强烈的忧患意识使国藩步亭林以自喻。

除了广泛结交志趣相投的忧时之士外，曾国藩还敢于犯颜直谏，对时政提出自己的见解，他的《应诏陈言疏》、《议汰兵疏》、《备陈民间疾苦疏》、《平银价疏》等，由于列举了吏治败坏、民生困苦的诸多问题，切中时弊，在封建士大夫中广为流传，从而更提高了他本人的声望。《湘军史稿》的作者龙盛运先生指出：“道咸之际，在经济文化上取得很大成就的湖南地主阶级，在社会动乱的前夜，逐渐靠拢在曾国藩的周围，出现以曾为中心实现自救的苗头”。^④应该说是合乎实际的。

当李鸿章受业曾氏门下的时候，正是曾国藩经世思想日臻成熟之际。对李而言，尽管初次会试落第，却使他在道光乙丙之际能有更多的时间与老师朝夕过从，实在受益匪浅。

大体说来，李鸿章在这一时期受曾国藩的影响，一在于诗文词章，兼及治学方法；二是讲求经世义理之学。曾国藩在文章写作上，曾狠下一番工夫，并以古文名世，他尤好韩愈古文，尝言：“予论古文，总须有倔强不驯之气，愈拗愈深之意。故于太史公外，独取昌黎、半山两家，论诗亦取傲兀不群者。”又说：“予好古人雄奇之文，以昌黎为第一，杨子云次之。”^⑤李鸿章

① 黎庶昌：《曾国藩年谱》，岳麓书社版，10页。

② 郭嵩焘：《养知书屋文集》卷五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诗文，60页。

④ 龙盛运：《湘军史稿》，四川人民出版社，40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》家书一，54页。

做诗，本自有一股铿锵之气，颇得曾氏赏识；至于作文，他在致三弟（鹤章）函中称：“余生平最喜读者，为韩愈《论佛骨表》，取其气盛也。”^① 显见是受曾氏影响所致。关于治学方法，曾国藩在《与弟书》中曾有一段精辟的教诲，“穷经必专一经，不可泛鹜，读经以研寻义理为本，考据名物为末。读经有一耐字诀：一句不通，不看下句；今日不通，明日再读；今年不精，明年再读。此所谓耐也。”^② 而据《异辞录》的记载：“李文忠丁未会试之先，辛苦用功，只温熟《诗经》一部，观公闾作《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》二句《四书》文，读公《朋僚函稿》时引《毛诗》，流露于不自觉，可以概见。古人通经致用，非谓通群经也，苟能通一经，用之绰有余裕。”^③ 这可以说是李鸿章对老师读经诀窍的心领神会了。

前文说过，曾氏治学长于义理，对经史的研读，亦下有很深的工夫，李鸿章曾受命为曾氏所编《经史百家杂钞》做过校订工作，他盛赞“曾公编此书，胆气颇大。”^④ 同时也养成了他喜好经史，尤其注重《史记》的读书习惯。^⑤ 在当时的经世学者看来，读书贯通，自能致用，然而真实见解还须在经史中求之，这不仅是曾国藩，包括李文安也是这样要求李鸿章的。^⑥

道光二十七年（1847），李鸿章丁未会试考中进士，朝考改翰林院庶吉士，“少年气象自峥嵘”，他以24岁的绝对年龄优势走完了科举考试的全过程，从此可以有更多的时间来关心和考虑军国大事了。捷报传来，曾国藩喜不自胜，他将李鸿章和门下同时高中的郭嵩焘、陈鼎、帅远燊并称为“丁未四君子”，^⑦ 期许他们仕途腾达，在日后的经邦治国中能有更大的作为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尽管曾国藩对青年李鸿章的思想影响如何之深，但他并非李鸿章在京城求学期间遇到的唯一师长。这一时期，他在父亲的引领下，先后拜访了吕贤基、王茂荫、赵昉等一千同乡父执前辈，这些人均对李鸿章另眼相看。如吕贤基就经常让李鸿章为其草疏言事，赵昉日后更成了李的岳父大人，而王茂荫关心民生疾苦、改革财政的思想，对李鸿章也不无影响。

① 《李鸿章家书》，2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家书一，55页。

③ 刘体智：《异辞录》，中华书局版，3页。

④ 《李鸿章家书》，2页。

⑤ 参阅苏梅芳《李鸿章自强思想之研究》，成功大学历史学报第16号，12—13页。

⑥ 李文安要求子弟：“我辈经济学问，仍须根柢经史，……读书人正宜拓开眼界，放宽胸襟，立定脚跟。……读书果能贯通，自能致用，真实见地还须在经史中求之。”《李光禄公遗集》卷八“寄玉坪六弟”。

⑦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15页。

尤其是考中进士后，他又相继与苏南潘、翁两权贵建立了师门渊源。丁未科主考官潘世恩，出身苏州世家名门，尽管他本人无论为官还是治学，都没有什么突出业绩，但他能在国运垂危的形势下，努力发现人才，早期曾经荐举过林则徐和冯桂芬，而李鸿章高中的丁未科，新进翰林中也是人才济济，不少日后成为同治朝的“中兴名臣”，与他的识拔恐怕不无关系。再就是被李鸿章称之为太老师的体仁阁大学士翁心存。是年，李鸿章的房师为翰林院侍读学士孙锵鸣，字槩田，浙江瑞安人，道光二十一年进士，会试出翁心存门下。因此，李鸿章中式后，按照礼数，曾经在孙锵鸣的带领下，前往拜访翁心存。对此，夏敬观《学山诗话》有一段绘声绘色的描述：“道光丁未会试，学士（即指孙锵鸣——引者）作房考官，李文忠鸿章、沈文肃葆楨，皆出其门。是科学士房中卷独少，甚为牢骚。一日，领门生辈谒见太老师翁文端心存，文端善风鉴，首见李文忠，即大惊赏曰：‘是人功业在我辈上’；以次见文肃，又激赏曰：‘当为名臣。’汝房中卷虽少，得此二人，复何憾。”^①

风鉴之说固不可信，但李鸿章为翁氏小门生确是不争的事实。上海图书馆所存李鸿章未刊函稿中，存有李鸿章于咸丰十年四月二十三日（1860年6月12日）在宿松曾国藩湘军大营时，写给时任安徽巡抚翁同书的信，信中自称：“鸿章会试出槩田师之门，通家谊重，未敢以属吏之礼进。”同时他还提到：“往岁供职词垣，曾亲炙中堂太夫子（即指翁心存——引者）渥荷训海，铭感弗谖。”^②可见，他不仅以门下晚辈自居，在咸丰初年供职翰林院期间，还当面接受过翁心存的训海。

那么，翁氏讲学的具体内容是些什么呢？据钱仲联记述：“道光一代，祁（寓藻）、翁（心存）两文端秉国政，俱以实学为天下倡。”^③翁氏讲授的“实学”，旨在“调和汉宋”，他认为：“汉儒之学如治田得米，宋儒之学如炊米为饭，”无所偏重。^④他的治学也同样有着浓厚的经世倾向，在弘德殿授读时，“授经之余，尝举古今治乱成败为上晰陈之。”^⑤在当时内忧外患频仍的局面下，他也大声疾呼，以引拔人才为第一急务。^⑥然而，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，翁心存与曾国藩之间，虽然都以精研义理声名卓著，却因门派迥异而相

① 夏敬观：《学山诗话》。

② 上海图书馆藏《李鸿章未刊函稿》001册。

③ 钱仲联：《梦苕庵诗话》。

④ 陈澧：《翁文端公神道碑铭》，《续碑传集》卷四。

⑤ 杨彝珍：《翁文端公神道碑铭》，《续碑传集》卷四。

⑥ 孙衣言：《翁文端公墓志铭》，《续碑传集》卷四。

互之间绝少往来。就曾国藩而言，其“始起由穆鹤舫，大用自肃豫亨。”^①也就是说，曾国藩是由穆彰阿、肃顺一系的荐拔才得以登上政治高位的。据薛福成记述：咸丰在世时，欲任命胡林翼为两江总督，“肃顺曰：‘胡林翼在湖北措注尽善，未可挪动。不如用曾国藩督两江，则上下游俱得人矣。’上曰：‘善。’遂如其议。”^②可见，曾、肃两人之间，确实有着非同一般的特殊关系。

反而言之，肃顺对翁心存则极力倾陷。据陈澧记：“公（即翁心存——引者）屡掌户部，慎持大体，……凡肃顺所为事，皆力止之。肃顺大憾，每事相齟齬。公以足疾请假，旋请开缺。”^③其子翁同书又记：“府君既去位，而肃公方贵重用事，会户部钞票案起，遂兴大狱。欲以奇祸中府君。上知府君无它，卒不深罪。当是时，微上保全，几不测。”^④曾国藩既与肃顺亲近，自然要与翁心存疏远了。检索这一时期的曾国藩书信，他与当时朝野诸多经学大师均有书信往来，但与翁心存却并无只字通问。派系倾轧的痕迹，依稀可见。

无论如何，李鸿章在京时，能依违两者其间，揣摩经世之学。也算是一种奇特的际遇吧。

三 主与幕僚

太平天国战争的爆发，改变了曾国藩和李鸿章作为封建士大夫的传统仕进之途。咸丰二年（1852），清政府命曾国藩以在籍侍郎帮办湖南团练，湘军由此发端。第二年春，太平军大举入皖，李鸿章“感念桑梓之祸”，怂恿工部左侍郎吕贤基上章并连夜代拟奏稿。奏上，咸丰帝即命吕贤基为安徽团练大臣，吕则奏调李鸿章偕行回乡，“翰林变作绿林。”^⑤从此，李鸿章便从一个专意功名的青年举子，成为一名慨然以天下为己任的团练头目，其经世致用之途也就此展开了。

曾、李二人，此时虽然天各一方，但曾国藩对这位门生的活动，仍是十

① 黄濬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136页。

② 薛福成：《庸庵笔记》江苏人民出版社版，12页；“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”。

③ 陈澧：《翁文端公神道碑铭》，《续碑传集》卷四。

④ 翁同书：《翁文端公行述》，同治刊本，13页。

⑤ 《异辞录》，6页、10页。

分关心。早在咸丰三年三月初八日，李鸿章随吕贤基甫一返乡，曾氏就致信其兄李瀚章：“令弟少荃正月随吕少司空出差至安徽，不知已得京信否？”^①同年十月廿四日，他又致函新赴任的皖抚江忠源：“吕鹤田少司空，与国藩契好，想与阁下相得益彰。李少泉编修，大有用之才，阁下若有征伐之事，可携之同往。”^②随后又函告瀚章：“昨寄岷樵书中，已令其亲敬鹤翁、少荃二人，想针芥契合，必能相与有成，保护珂里也。”^③

江忠源抵达庐州后，向曾氏去信请教作战及用人方略，曾国藩于十一月十八日复信中再次力荐：“此外闻吕鹤翁、李少荃当不差谬。”^④他如此看重李鸿章是有理由的：“皖中为粤匪上下骚扰之区，又兼土匪纵横，幸周敬修带勇在北，李少荃带勇在东，藉资剿捕。”^⑤他在给吕贤基的信中亦大加赞许：“闻阁下与少荃编修练勇剿匪，屡次奏绩，伏望部署储峙，早修同舟之谊，共图宏济之艰。至要至要。”^⑥与此同时，他还给李鸿章写过一封很重要的亲笔信，指出：“今日之兵事最堪痛哭者，莫大于‘败不相救’四字。”因此他提出必须“尽募新勇，不杂一兵，不滥收一弁，扫除陈迹，特开生面”地组建一支新军。并且谆谆告诫李鸿章：“闻足下所带之勇，精悍而有纪律，务望更加训练，束以戚氏之法。明年楚勇过皖，即与尊麾合成一军，将士一气，万众一心，一洗向日营伍之陋习，纵不能遽立勋绩，亦聊欲稍变气象，一泄积愤也。”^⑦当时，湘军尚在编练之中，他就将自己的建军思想和编练心得坦诚相告，足见对李鸿章的期望之殷了。该年底，庐州城被太平军围困的消息传来，曾国藩在给友朋的信中，屡屡提及江忠源、李鸿章、袁甲三等均是其“亲友至好”，“欲急一往援，而百事未就，不能奋飞。”^⑧焦灼之情，溢于词表。

而在李鸿章，却并未能像老师期望的那样，创立起一支赤地新立、别开生面的新军，相反，在他早期的团练生涯中，留下了不少“专以浪战为能”^⑨的记录。尽管他曾因咸丰五年秋率部夺回庐州的功劳，“奉旨交军机处记名以

①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138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11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15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67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22页。

⑥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63页。

⑦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64页。

⑧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387页。

⑨ 《异辞录》，23页。

道府用”，次年又因攻克无为、巢县、含山的战功，“赏加按察使銜”。^①然而他的几任上司吕贤基、李嘉端、福济等均非知兵善战的方面大员，遇合非人，以李鸿章傲物不群的性格，自然是“功”高易遭妒，当时“谣诼纷纭，谤讟屡起，鸿章几不能自立于乡里。”^②用李鸿章自己的话说：“余亦辗转兵间，无所就，久，乃谋引去。”^③

咸丰八年七月十五日，太平军再克庐州，李鸿章无处容身，遂携家眷辗转流离，前往南昌投奔时为湘军办理粮台的胞兄李瀚章。就在太平军攻克庐州的当天，李鸿章给恩师写了一封带有总结和检讨意义的长信，信中说：“窃念今日之事势艰难极矣，人才败坏极矣。惟吾师倡义旅于湘中，拂拭英奇，别树一帜，积年经营委折，独其深心，道力乃久而见功。泳芝中丞推衍余波，参时得地，发挥光大，抑亦人中之豪也。阖帅皆能如此用人理财，则兵不难治，贼不难灭矣。”对曾、胡等湘军将帅表示了无限仰慕之情，另一方面，他对自己办团练六年、一无所成而深感惭愧：“鸿章材质弩弱，不堪造就，无任事之力，徒有忧时之志。处桑梓兵燹，困心横虑，靡所补救，非其地、非其人，则无从学习也。”他在信末再三检讨对不起恩师的苦心栽培：“夙夜扞衷，愧汗交集。”同时又表示了想“挈轻舟谒吾师于江上，一敏提训”的投奔意愿。^④

曾国藩于八月廿日收到此信，得知李氏全家因庐州二度失守而流离失所时，便立即“奉上菲资三百金”给李氏兄弟作为安家之资，并在九月十八日给李瀚章的信中正式发出邀请：“少泉弟肯来欤助，望即迅速命驾。”^⑤当时，曾国藩的大营设在建昌，于是，李鸿章在南昌稍事安顿后，便于十月初十日

① 《李文忠公全集》，卷首第3页，国史本传。

② 梁启超：《李文忠公事略》。

③ 李鸿章：《原任安徽按察使张君（印塘）墓表》，《李文忠公遗集》卷四。

④ 按：此信收于《合肥李文忠公墨宝》（藏安徽省社科院淮系集团研究中心），系李氏门生黄书霖所收李鸿章致曾国藩信札手稿28通，续笺3章，“民国”七年石印，起自咸丰八年，终至剿捻时期，均为《朋僚函稿》所未收。此信系第一封，写信日期为咸丰八年七月中元日。曾氏收到日期为八月廿日，在李氏早期信稿中，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，黄书霖在信稿后附有一首赞诗：“相业渊源一贯之，丈夫羞作乞怜辞（原注：书起咸丰戊年，公正军困，依人不屑，俯首作怜语），安排四十余年事，珍重茅屋不出师。”可略见李入曾幕之前后渊源。

⑤ 《曾集》书信一，682页。按：（1）此函题为“加李元度片”，根据内容则是写给李瀚章的。似误。（2）在此之前，曾氏在六月十八日致李瀚章信中，有“少荃仁弟均此不另。”似已知道李鸿章将去兄处。（3）王尔敏《淮军志》及李守孔《李鸿章赞襄湘军幕府之表现》均以十月初一日，曾国藩致郭嵩焘信为曾约李来营的最早记载，不确。应以此为准（按：据岳麓书社《曾集》编辑部同仁介绍此信原题签为“致李观察”，实应指瀚章）。

前往拜谒，并留为幕僚。

应该说，对于招纳李鸿章，曾国藩表现得十分主动和热情，这在他的书信和日记中多有流露。如他在十月初一日信告郭嵩焘：“筱泉家被贼焚劫，挈眷至南昌，日内亦即来营。少泉亦约来此一叙。‘风雨如晦，鸡鸣不已’。古人不余诬也。”^①又在十一月廿五日的日记中记道：“闻李少泉已过广信，即日将来营会晤，为之欣喜。”^②复于十一月廿八日函告沈葆楨：“少泉、次青、仙屏三人，皆于年内可到。国藩目花而手钝，不得诸君则事不能了。”^③至十二月初八日又函告彭玉麟：“筱泉之弟少荃日内可至营，筱泉可替回。”^④于此，可以说是企盼之至了。

李鸿章到营后，曾国藩与之连日促膝竟夜长谈。^⑤当时，湘军适值三河惨败，元气大伤，亟需人手；曾国藩也需要通过李鸿章了解安徽战场援物详细情况。湘军作战以水师最强、步兵次之，而马队最弱，这个短处在皖赣战场上已经暴露出来，李续宾三河之败和吴国佐景德镇之挫，均是马队不敌太平军所致。因此，曾、李会面第十天，曾国藩就决定让李鸿章派人去皖北霍邱一带招募五百马勇。他在致胡林翼的信中说：“李筱泉之弟少荃名鸿章，丁未编修，其才与气似可统一军，拟令其招淮勇，操练马队，渠久客吕鹤翁处、福元翁修处，阅事过多，不敢轻于任事，刻尚未相许也。”^⑥的确，李鸿章感到此事责任重大，特地赶回南昌与李瀚章商议，李瀚章亦觉此事难行，代其弟出面恳辞。曾氏遂复信李氏兄弟：“此次招勇五百，但试淮南勇之果能操习马队否耳。不特少荃不敢自信，即仆亦茫无把握也。……贤昆仲不必遽以任事之难为虑。”^⑦于是李鸿章接受成命，派人赴皖北募勇，但当时两淮间太平军和捻军势力正盛，地方团练和官府虚与委蛇，忙了几个月，此事不果而终。

接着，五月中旬，曾国藩又命李鸿章加入曾国荃部参赞军务，以加强实战的历练。相传李鸿章初至军营时，曾请这位比自己仅小一岁的“师叔”题词以示尊重，曾国荃却大言不惭地手书对联：“门多将相文中子，身系安危郭令公。”^⑧李鸿章大为不快，遂萌去意，于是曾国藩复于五月十七日、六月廿

① 《曾国藩全集》书信一，697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》日记一，329-330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749页。

④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一，757页。

⑤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日记一，333-336页。

⑥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二，827页。

⑦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二，858页。

⑧ 刘声木：《畏楚斋三等》卷六，10页。

八日两度函劝：

“阁下此行，其着意在察看楚军各营气象，其得处安在？其失处安在？将领中果有任重致远者否？规模法制尚有更改者否？一一悉心体察，在阁下既可量而后入，在敝处亦可度德而处。阁下夙才远志，自是匡济令器，然大易之道，重时与位，皆有大力者冥冥主持，毫不得人力与于其间。”^①

“观阁下精悍之色露于眉宇，作字则筋胜于肉，似非长处玉堂鸣佩优游者。倘为四方诸侯，按图求索，不南之粤，则东之吴，北之齐、豫耳。”^②

在此期间，曾国藩于五月廿六日上奏，将李鸿章留营襄办军务。^③五月底，李鸿章随曾国荃出征，与太平军杨辅清部大战于景德镇，解了张运兰老湘营之围。曾国荃回师抚州后，李鸿章于七月十六日返回建昌大营，正式担任曾国藩的机要幕僚，此后便一直追随在曾氏左右，参赞军务，帮办文案。

曾国藩既有知人之能，又有爱才之名，薛福成评论说：“曾国藩知人之誉，超秩古今。或邂逅于风尘之中，一见以为伟器；或物色于形迹之表，确然许为异材。平日持议，尝谓天下至大，事变至殷，绝非一手一足之所能维持，故其振拔幽滞，宏奖人杰，尤属不遗余力。”^④就当时的实际情形而言，湘军幕府之盛，为世所称道；而广招人才，求贤若渴，确是曾氏的一贯作风，当时，“文正幕府人才济济，有三圣七贤之目。”^⑤曾国藩对此亦有诗自诩：“幕府山头对碧天，英英群彦满樽前，共扶元气回阳九，各放光明照大千。”^⑥事实也是，日后充任将帅疆吏的一大批“中兴名臣”，不少人出自曾国藩幕府。曾氏本人曾经十分精当地点明其培养幕僚的诀窍：“营务处之道，一在树人，一在立法。……树人之道有二：一曰知人善任，一曰陶冶造就。”^⑦李鸿章从帮办曾国荃前敌营务处，到帮办曾国藩大营营务处，曾氏对他的倚重和赏识可以想见，他曾对人言：“此间一切，取办于国藩与少荃二人之手。”^⑧又说：“少荃天资与公牍最相近，所拟奏咨，皆大有过人处，将来建树非凡，或竟青出于蓝亦未可知。”^⑨

① 《曾国藩全集》书信二，990页。

② 《曾国藩全集》书信二，1003页。

③ 《曾国藩全集》奏稿二，985页。

④ 薛福成：《庸庵文编》卷一，《代李相拟陈督臣忠勋事疏》。

⑤ 黄浚：《花随人圣庵摭忆》，233页。

⑥ 《曾国藩全集》诗文，91页。

⑦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日记一，417页。

⑧ 《曾国藩全集》，书信二，1518页。

⑨ 薛福成：《庸庵笔记》卷一，“李傅相入曾文正公幕府”。